

完善行政主導合組「香港隊」共繪由治及興新篇

香港自回歸祖國以來，行政立法關係始終是特區治理的重要基石。近期，行政長官李家超與立法會議員出席對談交流會，正值立法會首次赴京完成國家事務研修考察。這一連串密集而務實的互動，不僅是「愛國者治港」原則下行政立法關係邁向成熟的生動註腳，更深刻呼應了去年底國家主席習近平聽取李家超述職時提出的「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的戰略要求，立法會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繪就香港由治及興的新篇章。

黎子珍

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聽取李家超述職時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二十屆四中全會對「十五五」時期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戰略擘畫，強調要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特別行政區政府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扎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一指示為香港特區的治理指明了方向。「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是基於基本法設計的政治體制核心要義，要求特區政府擔當起治理香港的主體責任。

形成強大治理合力 落實行政主導

今年1月，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 促進特別行政區良政善治」專題研討會上致辭表示，「習近平主席在聽取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述職時，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都提出了『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的明確要求」，「為特別行政區落實行政主導、提高治理效能、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方向，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深遠的歷史意義」。行政主導作為基本法設計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原則，根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度保障。實行行政主導是維護特別

行政區憲制秩序的必然要求，是確保「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必然要求，是從港澳實際出發、實現特別行政區高效治理的必然要求。行政主導體制在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功實踐，展現出強大生命力和優越性。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關鍵是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強化香港、澳門當家人意識，切實擔負起治理香港、澳門第一責任人的責任；需要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積極支持配合，形成強大治理合力；離不開社會各界支持參與，共同營造落實行政主導的良好社會氛圍。

李家超及其團隊對「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念茲在茲。在對談交流會上，李家超強調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同屬「香港隊」，目標一致，都是為市民解決問題。這種定位超越了傳統的「配合」與「制衡」論述，將行政立法關係提升至「隊友」層級。特區政府通過立法會前廳交流會、互動交流答問會乃至此次首創的對談交流會，主動搭建溝通平台，正是行政長官作為特區首長積極有為、落實行政主導的具體體現。

行政立法同頻共振 增強發展動能

回顧第八屆立法會會期，行政立法關係已徹底告別過往對抗、拉布的撕裂局面。此次立法會赴京研修班，更被視為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創舉。議員們在國家行政學院系統學習了中央治國理念、國家「十五五」規劃制定及

國際地緣政治等課程，不僅是知識的充電，更是從大局觀上促進立法會與行政機關同頻共振。

研修歸來後的對談交流會，則將所學迅速轉化為治理動能。會上，議員們分享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北部都會區建設的見解。有議員借鑑考察北京「12345」市民熱線的經驗，提出優化香港「1823」熱線的建議並獲積極回應。這充分證明，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動已不再停留於表面和氣，而是轉化為解決市民急難愁盼問題的具體行動力。李家超指出，通過换位思考和深度對談，有助於整合不同視角，找出解決難事的有效方法。

立法會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支持，在實際行動中展現得淋漓盡致。立法會主席李慧琼表示，相信只要行政立法保持良性互動、高效協作，定能解決香港民生難題，增強發展動能。這種支持並非盲目附和，而是在充分掌握國情、區情後的理性抉擇。

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表和特區管治團隊的重要成員，正在從單純的「監督者」轉變為「建設性的改革夥伴」。從支持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履行憲制責任，到積極審議北部都會區法例，再到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建言獻策，立法會以實際行動詮釋了「愛國者治港」的責任擔當。行政立法機關同坐一條船，正匯聚成強大的「香港隊」合力，共同繪就香港由治及興的新篇章。

深化行政立法互動 共謀對策促科教興港

劉智鵬 立法會議員 全國政協委員



7月28日上午，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首場「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對談交流會」時表示：「我視特區立法會

為特區政府的改革夥伴，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同是『香港隊』，目標相同，都是為市民解決問題。」這一表述打破傳統行政立法對立的思維，確立雙方作為同一團隊的定位。不同於立法會常規會議，這次在寬鬆環境下的對談，讓行政長官和議員好像隊友一樣直接交換意見，作出既有溫度亦有深度的真誠溝通，與以往在議事廳舉行的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互為表裏，發揮更大的溝通效益。

在交流會中，筆者就北都大學城發展向李家超表達意見。香港的北部都會區將會成為全球高等教育樞紐以及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這說法其實建基於一項基本因素：高等院校與創新經濟之間存在着深厚的共生關係。這種聯繫是當今世界各國發展引擎的核心所在，香港也不應例外，北都大學城更不應例外。

香港有五所大學持續位列全球百強，大學教授的人均研究產出媲美世界任何頂級高等院校。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擁有資訊、資本與人才自由流動的環境優勢，世界罕見。

共謀香港高等教育未來之路

然而，擁有優質的大學、良好的科技產業、一流的作業環境，並不等於擁有一個卓越的創新生態系統。大學與產業必須協同合作，甚至融為一體，方能抓緊北都大學城區的機遇，為香港創造下一個東方之珠的神話。

放眼當下，全球最成功的創新經濟體，並非那些擁有頂尖大學或最佳科技公司的地區，而是那些大學與科技公司深度交織、難以分辨彼此邊界的地區。波士頓的肯德爾廣場是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與數百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活態融合體；深圳的清華大學校區深深嵌入城市硬件生態系統，學生在華為、大疆等企業實習是培養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史丹福大學不僅為硅谷培養員工，其本身即構成科技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三個案例的共同特徵是一種整合文化，系統性地打破校園與企業之間的邊界，以達至大學與產業共融的效果。

團結治港力量 提速建設幸福北都

姚銘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前日上午舉行首次「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對談交流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與67名議員在從容氛圍中進行逾一個半小時的交流。這場有溫度、有深度的對談，是本屆特區政府繼「前廳交流會」及「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之後，推動行政立法關係的又一創新之舉。在沒有發言時限壓力的情況下，行政長官與議員可像「香港隊」隊員般坦誠對話，甚至分享心路歷程，既增進相互了解、拉近距離，也可團結「香港隊」，為良政善治築牢基礎，特別是能夠共商方案，支持北都建設，改善市民生活，優化當區民生建設，賦能香港高質量發展。

作為在粉嶺長大、19歲便投入社區服務的新界居民，筆者對新界北的交通問題感受特別深。隨着北部都會區發展，居民陸續遷入，以往的道路設計難以滿足需求。只要北區兩個迴旋處一有意外，經粉嶺公路往來九龍的車輛，往往可以塞上幾個小時。因此，筆者在「對談交流會」中建議，期待北區的道路工程能在新材料、新技術的應用下加快推進；同時港鐵在繁忙時間加密班次，爭取北環線更多車站分階段通車。社區配套

香港其實已經具備上述必要元素，目前所需的是構建整合的架構。整合大學與產業可以從五個維度着手：一、物理鄰近性：建立連接校園與企業的創新走廊及共享空間，促進人員互動。二、人才流動性：推行大學與產業雙聘計劃，實現產學項目與創業實踐，培養創業者及具推動能力的員工。三、智慧財產權：利用普通法優勢制定快速清晰的授權框架，縮短授權時間以吸引投資。四、資金配置：推動企業資助大學研究，以早期獲取權換取資源，同時保障學術獨立。五、教育體系改革：讓學生參與真實產業項目與創業實踐，培養創業者及具推動能力的員工。

本屆特區政府在建設香港成為國際高等教育樞紐上取得了亮麗的成績。非本地本科生所佔的比例由年前的20%遞增至今年九月新學年的50%，而且報名人數和成績均錄得顯著的增長。然而，非本地生的快速增長並未完全符合國際高等教育樞紐的指標；我們在吸引歐美先進國家的青年來港就學方面仍有待努力。

打造條件優越的初創土壤

今日全球人才競爭激烈，那些將會建構下一代人工智能公司、生物科技企業、量子計算初創公司的青年學生，此刻正在決定去何處求學、居留及創業。他們提出的問題是：「何處可以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並將我的研究轉化為產業鏈中的一環？」目前的答案往往是史丹福、麻省理工、清華或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的大學其實應當名列其中。

試想有朝一日，一名在香港北都大學城學習人工智能的學生，與深圳硬件科技公司合作推出項目，在數碼港向投資者路演，最後根據香港普通法註冊公司，並在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球擴展業務。這樣美好的未來，其實只會在香港實現。香港只要將這夢想變為事實，就有能力號召全世界有為青年前來就學、就業、創業，然後共同協力將香港打造成為世界領先的政產學研投示範單位。

綜觀未來，香港的大學不可能只是閉門研究、上課講學的場所，而是推動產業發展的核心動力。我們必須停止將大學與產業視為兩個獨立領域，而是將其視為一個生態系統：大學校園即是初創企業，實驗室即是產品，教授即是創業者；如此設定，香港才能善用北都大學城，為香港創科產業創出輝煌成績。

亦必須同步跟上，特別是原區就業機會，避免市民搬入後仍要長途往返外區上班，令道路與鐵路系統承受過大壓力。

對談交流會的「去形式化」，正好讓議員能直接、務實地反映地區實況與市民訴求，亦讓行政長官及政府團隊第一時間掌握問題核心。行政立法關係的良性發展，從來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當雙方在坦率交流中凝聚共識，便能更有效破解長期積累的難題，為市民謀福祉，為北都發展提速提效。

「愛國者治港」是全體治港者團結一心、共同奮鬥的實踐過程。首場「對談交流會」成功舉行，為行政立法良性互動打開新窗口。筆者期待這類交流能夠恒常舉行，並持續優化，讓行政與立法這對「改革夥伴」在相互理解中凝聚共識，在良性互動中為香港謀求更大發展。只要繼續以創新思維推動交流，心同向、行同步、力同聚，必能在由治及興的新征程上，為香港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中國開放模型 奠定AI生態演化方向

陳柏瑾 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
熊 偉 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7月24日，美國多家科技企業聯署並發布《開放權重與美國人工智能領導力》文件。微軟、英偉達、OpenAI、Meta、IBM、Hugging Face等企業和機構均出現在名單中。這份文件表面上是在討論模型開放，實際上更像一份產業路線圖。簽署者擔心的是：如果華盛頓以國家安全為名，限制開放權重模型，美國可能先失去的不是技術領先地位，而是AI在本土經濟中的普遍使用。

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國月之暗面7月27日發布Kimi K3完整模型權重。一場圍繞前沿AI能力應否開放、由誰控制的爭議，已經在模型正式公開前升溫。

AI產業正面臨發展路線之爭

美國科技企業這次站出來，並不意味着它們突然擁抱了技術理想主義。不同企業有不同的現實利益。

英偉達希望更多模型被訓練、部署和運行，因為這直接帶來GPU、服務器和推理基礎設施需求。微軟面對的則是企業客戶：這些客戶不願把所有數據、工作流程和模型能力都交給單一API。Meta、Mistral和Hugging Face受益於開放模型生態，而IBM、Palantir等企業軟件和系統服務商，也需要把AI部署到政府、金融、醫療和國防等對數據控制要求較高的領域。

各科技企業共同擔心的是，如果「開放權重」被整體定義為安全威脅，先進AI能力就會集中到OpenAI、Anthropic等少數閉源公司手中。企業客戶將失去選擇，API成本和供應商鎖定期問題會加重，初創企業與大學實驗室的創新空間也會受到擠壓。

因此，這份文件反對的並不是追究非法技術竊取，而是把開放權重本身變成監管對象。文件提出，美國的AI領導力不應只用某一個模型的性能來衡量，更要看先進能力能否進入工廠、醫院、學校和政府系統。

這是一種重要的競爭觀變化。AI競爭不再只是比較誰的模型排名第一，也要比較誰的模型更容易被開發者採用、更便宜地運行，以及誰掌握芯片、雲服務、開發工具和應用生態。

Kimi K3在Frontend Code Arena上的表現引起關注。公開排名顯示，它在多個前端編程類別中超過了Anthropic的Fable 5。

不過，單一排名不能代表模型的全部能力。測試樣本、提示詞、工具調用方

式和模型版本都會影響結果。K3在某些任務上領先，並不等於它已經全面超越美國閉源模型。K3的意義更在於它所代表的方向。

根據月之暗面官方資料，Kimi K3擁有約2.8萬億總參數和100萬Token上下文窗口，採用Kimi Delta Attention、Attention Residuals以及稀疏混合專家架構。模型通過稀疏路由設計，每個Token只激活896個專家中的16個，以降低實際運行成本。

這裏還需要區分「開放權重」和「完整開源」。開放權重意味着模型參數可以被下載、部署和修改，但訓練數據、訓練代碼和完整開發過程未必公開。即便如此，K3仍然動搖了兩個舊判斷：開放模型未必只能靠低價競爭，中國模型也未必只能停留在追趕位置。

如果高性能模型可以被下載、部署並由不同開發者繼續修改，它的影響就不會停留在開發公司內部。它可能進入雲平台、企業服務器、大學實驗室和邊緣設備，形成不依賴單一公司的開發網絡。模型一旦可以被下載，美國政府面對的就不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一批可以自行運行和修改模型的開發者。

美國藉口「蒸餾」施制裁欠理據

「蒸餾」本身是AI行業常用的訓練方法。Anthropic在今年2月的聲明中也承認，蒸餾可以把大型模型的能力轉移到更小、更便宜的模型中；但該公司同時指控DeepSeek、月之暗面和MiniMax利用約2.4萬個虛假賬戶，與Claude進行超過1,600萬次互動，以提取模型能力。

因此，爭議不應簡單歸結為「蒸餾是否合法」，而要追問幾個更具體的問題：訪問是否獲得授權，是否使用虛假賬戶或繞過地區限制，相關輸出是否被大規模用於訓練競爭模型，以及這些行為是否違反合同或侵犯知識產權。

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克拉齊奧斯指控，月之暗面為大規模蒸餾美國模型建立了複雜平台；財政部長貝森特也表示，若確證涉及工業級技術竊取，美國可能考慮制裁。

但在公開層面，目前仍主要是美方指控、月之暗面否認以及專家質疑，外界還看不到一條可以獨立覆核的完整證據鏈。

時間線也值得注意。Fable 5於6月9日發布，6月12日因美國政府的出口管

制指令暫停訪問，7月1日重新開放；Kimi K3則在7月中旬發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大規模訪問、蒸餾、訓練、測試和發布，確實存在技術疑問。

在現有公開材料下，制裁仍需要更充分的證據支持。真正有價值的材料，應當包括訪問日誌、賬戶關聯、請求模式、輸出指紋和獨立復現實驗，而不是政治人物的公開指控或社交媒體上的模型對比。

模型傳播勢頭不可阻撓

美國現在面對的難題，不是要不要開放，而是開放之後還能控制什麼。

閉源模型的控制邏輯很清楚：開發者可以更新安全策略、追蹤用戶、關閉賬戶，必要時撤回服務。開放權重模型一旦發布，控制權就會轉移到下載者手中。只要擁有足夠算力，任何機構都可以在自己的服務器上運行模型，甚至修改原有的安全機制。

因此，美國政府未來能夠直接施加影響的，主要是模型外圍環節：芯片和服務器、雲服務和數據中心、模型託管平台、企業採購以及供應鏈合規。

Axios披露，美國政府內部曾討論實體清單、政府採購限制、網絡安全警告，以及要求美國企業對託管中國模型承擔安全責任等方案。

這些措施可以提高使用成本，卻很難真正刪除一個已經進入全球網絡的模型。模型不像一批芯片，無法在邊境被扣下；它更像一段已經被複製出去的代碼，限制發布者並不等於能夠收回所有副本。這正是開放權重與傳統出口管制之間的差別。美國可以限制算力和服務器，卻很難完全限制模型在全球範圍內繼續傳播。

AI使用規則必須跟上模型開放。開放權重不會天然帶來安全，它可以讓更多研究人員參與審計、測試和漏洞修復，也可能讓惡意使用者移除安全限制、複製模型並擴大攻擊能力。

更現實的做法，是把技術開放與責任追蹤分開處理。正常的模型研究、評估和經授權蒸餾應當繼續進行；虛假賬戶、繞過訪問限制和非法提取則應受到追究。前沿模型也應披露技術報告和風險邊界，高風險應用則需要接受第三方測試和部署審計，責任應當更多落在訪問方式、部署場景和實際傷害上，而不是簡單按照模型國籍進行封鎖。